

苑书义 等著

中国近代史

下册

新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

新编

下册

苑书义等著

K25/60=2
:3
2007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修订本)/苑书义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01-006084-2

I. 中… II. 苑… III. 中国-近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2771 号

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

ZHONGGUO JINDAISHI XINBIAN

(修 订 本)

苑书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0.625

字数:47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084-2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卷本)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在此后世纪之交的二十几年里,中国近代史学园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犹如日出之江花,春来的江水,鲜明艳丽,美不胜收。有鉴于此,人民出版社毅然决定修订重印本书,这既是嘉惠学林之义举,又是对作者的鼓励鞭策。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嘱我写篇序言,谈谈自己对中国近代历史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恭敬不如从命,兹特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们,如有差错,文责自负。

从科学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但过去人们往往依据新旧民主革命,将110年历史划分为前80年和后30年,前者称为近代史,后者归入现代史。由于时间、素养等缘故,这篇序言的论述范围,只能因袭旧贯,局限于前80年,尚祈方家谅解。

*

*

*

近代中国历史主题

当前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有所谓革命范式和近代化范

式之争。其实,革命和近代化两种范式都有其存在价值,两者研究的中心有所不同,前者研究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后者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演变。但两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前者离不开后者,而后者并不排斥前者。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主题,革命范式论者坚持反帝反封建说,近代化范式论者则断定为近代化。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真实呢?

“满天风雨满乡愁,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原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封建社会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前进了一个时代。封建社会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向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演化,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从独立国过渡到殖民地的“中间”形式。近代中国在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同时,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从而使封建社会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形式。中国之所以变成半封建社会,是因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既迫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进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又通过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保持封建剥削和封建专制统治、推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等途径,控制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和财政,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

国的近代史。”^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即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改变半殖民地地位,建立民族国家;一是实现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就是变传统农业社会为近代工业社会,变封建专制为民主政治,变旧文化为新文化。中国近代化的实质,是推封建主义之陈、行资本主义之新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就国际环境来说,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资本帝国主义是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信奉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它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它依靠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逐渐地把落后的国家变成自己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以期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攫取高额利润。面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从西方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②就中国国情而言,当时在中国社会内部,生长着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压迫、推进资本主义化的力量。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不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民族资产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阶级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以先进阶级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器库中汲取进步思想,不仅主张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而且通过兴办实业和启蒙、改良或革命的实践,力图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推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虽然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但尚未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在西方已经弊端丛生,但是在东方的中国却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现实理想。20世纪初,列宁曾经指出:“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①

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虽属不同范畴,不能相互替代,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之下,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②同样,只有推进传统社会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政治,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才能逐渐积累起足够的阶级和物质实力,完成“反对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

革命与中国近代化

革命范式论者批评近代化范式淡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而近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②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代化范式论者则断言近代化涵盖并超越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其实,既不应离开近代化而孤立地谈论反帝反封建革命,又不应低估反帝反封建革命对近代化历程所起的先导作用。

近代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只要搞清经济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关系,其余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这里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只能形成“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①的格局。

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然而中国资本主义是由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构成的。据统计,1920年中外产业资本合计236,825万元,外国资本占70.4%,本国资本只占29.6%,外国资本压倒了本国资本。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逐渐地增长着,但却始终步履维艰,没有建设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20年近代工业产值占4.9%,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占95.1%,这说明鸦片战争后历经80个漫长岁月,中国才仅仅积累起4.9%的进步的、和古代不同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占95.1%的经济生活还依旧是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中国农村中虽然出现了以经营地主、富农和新式垦殖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其产值却微乎其微,因而无法改变近代中国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占据绝对优势的格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半封建经济是个汪洋大海,资本主义经济是零星孤岛。“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2页。

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①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从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破门而入,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而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尚未发展成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中国社会中还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因而推动历史的仍是农民这一个阶级,农民群众掀起了席卷神州大地的太平天国风暴,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地上天国”而奋斗。但是“地上天国”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而决不可能变为社会的现实。

19世纪60—70年代,由于洋务派兴办军事、民用工业和地主、官僚、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破土而出,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被抛到社会的表层,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蓄意依靠旧社会带着皇冠的代表人物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及至20世纪初期,在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业已具备独立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图把皇帝拉下马。1914—1920年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有所增强,但是无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却更为迅速。据统计,中国产业工人在1913年时为一百余万人,到1919年猛增至200万人左右。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320页。

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阶级基础。“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①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考诸世界历史，就会发现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都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发生的，英法两国资产阶级依靠用暴力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得的政权，改造封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确立起来。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英法两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和政权问题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新的经济形态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民主主义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现。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②这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0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81页。

些好心人的幼稚的梦之所以幻灭,归根到底,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企图不改革旧的政治而实现资本主义化。所谓旧的政治,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凭借政权的力量,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压迫和阻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若不改革这种旧的政治,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外争独立,内争民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改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格局,就必将“永久化”。要彻底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经济近代化,就不能告别反帝反封建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国家政权从中外反动派转到人民手中,是实现经济近代化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事实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民族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步伐。19世纪60—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同太平天国风暴震撼了封建基础不无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直接导源于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的反帝狂飙,以及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对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打击。此后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除了因为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之外,辛亥革命推翻资本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统治无疑是重要动力源泉。然而,由于上述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解决国家政权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创造出经济腾飞的政治前提,民族资本主义就只能像蜗牛一样蹒跚地爬行,中国经济近代化就因为缺乏政治前提,无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取得突破性进展。

西学与中国近代化

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近代化,是其各自社会矛盾自然演化的结果。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近代化,除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动力之外,还是对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国际环境迫使中国只有实现近代化才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而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彻底改变那种被马克思斥之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在坚持反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勇敢地走向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主动地多渠道地引进西学。

西学即西方近代文化,既是多元的统一体,又有许多层次。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①。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文化,只是就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言。其实,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的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完整的文化形态。所谓西方近代文化,主要就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文化构成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先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随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相继传入中国,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专家研究表明,任何文化都是由外在物质、中间理论和制度、内部心态三个层面构成的有机体。当两种文化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外在的物质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的理论 and 制度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即心态层面。”西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

人到文明中来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文化挟雷霆之势涌进古老的中华,驱赶着鹅行鸭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谋求社会的近代化,主动地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表现为东西方两种民族文化的撞击、交融和文化三结构的依次展开。当然,这只是就整体而言,系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所侧重,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互相交叉、重合和渗透。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构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在中国社会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构成的封建阶级文化。两种异质文化一经接触,就开始了撞击和交融的过程,犹如投石击水,激起层层波澜。守旧分子排斥西学,先进人士力主学习西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始终。守旧分子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站在古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抱残守缺,断言救国之道“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应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他们攻击学习西方、“变成法”、“兴民权”,是“辩言乱政”、“用夷变夏”。他们惧怕引进西学会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封建体制的破裂,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封建一统的旧时代里去。

与守旧分子不同,先进人士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主张效法西方,改造中国。当然,所谓先进人士,就其阶级性格和具体主张而言,并不是什么超时空的,而是随着雷奔电驰似的社会变动新陈代谢着。早在19世纪40年

代,当清王朝的声威被不列颠的枪炮打得扫地以尽的时候,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从“经世致用”观念出发,经过比较探索,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显示出某种优越性。他们“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他们身上最早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所共有的思想特征:为了反抗西方侵略,就必须学习当时还是先进的西方。不过,他们所领会的“西学”,主要系指西方近代文化物质层面的所谓长技,而值得师法的西方长技,也只停留在“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上。把林、魏“师长之说”付诸实施的,是以一批满汉军政要员为中坚的洋务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为杠杆,“借法自强”,在19世纪60—90年代,推行洋务运动。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方为用”这一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他们把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视为“郅治保邦”之“本”,而把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看作“末”。他们采用西学,举办洋务,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仅排除了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政治内容,而且“师彼所长”仅仅属于治标性质,目的还恰恰在于固本。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采用西学,举办洋务,固然给西学提供了一个晋身之阶和用武之地,成为中国国防、经济和科技近代化的催化剂,但是,由于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只想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冑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而就决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要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就必须冲破

“中体西用”的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先窥其崖岸的,是那些参与洋务、有志西学的人士。而最终试图将其实施的,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登上舞台,植根于资本主义土壤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革命派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而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政治,则成为他们制定近代化模式、开展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推进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导航仪。

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派“摄力胜人”,革命派居于次要地位。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基于由学习西方科技走向改变与这一学习不相适应的固有制度的历史要求,倾向于冲破“中体西用”的防线,但是阶级的局限和深厚的儒学素养,又使他们对中体有一定的依恋之情,因而他们力主以中学为主,中西糅合,新旧并陈,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①。他们和洋务派不同,不仅主张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而且执意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上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要求在保存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求得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他们把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巧妙地冶于一炉,借用“孔子圣道”——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表述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既为“革故鼎新”提供了论据,又否定了社会发展中的质的飞跃,从而导致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的结论。他们还倡导“西学中源”说和“托古改制”理论,前者力图用传统文化外衣把西方近代文化笼罩起来,以便在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32页。

时,既“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的同意”,又能冲破“中体西用”的壁垒,把延纳西方近代文化的层次引向深入;后者打着“起亡经,翼圣制”的旗号,凭借所谓“孔子布衣改制”的符咒,保护着自己以布衣而改制的活动,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乎古训”的。他们请出孔子的亡灵作为自己的保护神,并且在圣经贤传的掩盖下宣扬资产阶级的变法主张,说明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他们希望在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条件下来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改革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他们也希望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某种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改革。穿着久受崇敬的封建圣人孔夫子的服装,借用封建正统思想儒家经学中今文学派的语言,依靠旧社会带着皇冠的代表人物,演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新场面,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妥协,埋伏着复古主义的种子。然而,尽管如此,改良派学习西学,倡导变法,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革命派压倒改良派而成为主流派。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当时革命派表现出比改良派更加昂扬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精神。列宁曾经评论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领导亿万人民“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 18 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①如果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是一批来自传统文化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425—426 页。

营垒的新旧参半的士大夫的话,那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主流就是一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承受的传统文​​化束缚较少,而取法西方文明的决心很大。他们冲破“中体西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论模式,抛开“公羊三世”、“托古改制”等旧瓶新酒形式,不要孔子,不靠经书,而是公开地用一种“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武器库中搬来了更多的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他们或则标榜:“民约服卢梭,强权伟斯宾,潜心观天演,愿从达尔文。”^①或则欢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②与康有为等不同,他们的进化论采取了自然科学的直接而简朴的形式,他们把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视为福音,把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看成楷模,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最高理想。然而,他们仰慕西方文明,主张对之“采取开放态度”,但却反对“全盘照搬”,宣称“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③由于他们的革命事业立足落后于西方的东方的中国,而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里,所以他们既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共和国方案,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弊病,幻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既批判封建主义,又继承优秀的民族遗产,以便“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④。这种中西文化融

① 松岑:《今怀》。

②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2—653页。

③ 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